



The Biblical Library
圣经图书馆

道路与真理

——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

THE WAY AND TRUTH:

The Gospel of Joh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谢文郁 著

道路与真理

——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

The Gospel of John in the

谢文郁◎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路与真理 / 谢文郁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17-9236-0

I. ①道… II. ①谢…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7514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道路与真理

谢文郁 著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总机 021-60821666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8.5
字数 54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17-9236-0/B · 688
定价 98.0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圣经图书馆

主编：杨克勤 梁慧

缘 起

自西学入华以来，中国文教体制分崩离析，中国学人一直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文明如何轻而易举割断我们的学统，终止了我们的道统。中西之争的题域一直困扰着我们。其实，中西文化各有其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及宗教文化之渊源，而这些渊源无不以古雅圣贤经书为开端和基石，形成经典。所谓“经典”，系指一种影响悠久文明形态走向的文本源头，蕴涵先知圣贤的智慧，其历经时间的长久考验，仍然能作用于今天的世界共同体与文本进行生命交汇，具有孕育一种重植根基、重温知新、重现思想的能力。刘勰《文心雕龙》道：“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宗经第三）“经典”的魅力在于它隐含宇宙秩序的永恒原则，背负磅礴的天理及诚意，其理想和认知超越了所起源的历史人文环境，构筑了现代社会、经济和文教体制的重要基础。因此，倡导以经典为基础和以文本为依据的主要目的：一，避免对古文化“道听途说”或“皮相论据”；二，以治经方法回归原典，重拾学统学理，从中取得借镜，在与圣贤的席谈中，寻索真知灼见，破解“中西之争”之伪；三，回归经典意味当下，我们要从“中西之争”的题域回归“古今之争”的视域，进而通达“古今之变”。

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基石之一是圣经。本丛书“圣经图书馆”以希伯来和基督宗教正典文本为经，以人心并大道的普世共通性为纬，勾勒整全西方文明的基础图景，诚如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先生行状》）虽然这些经典的思想源流、历史演进和影响主要在西方，但希伯来和基督教会智慧发源于古代西亚，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的精神珍宝和学术宝库，故使徒保罗写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洲、督责、使人归

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16)

本丛书“圣经图书馆”旨在引介、注疏、移译和诠释各部经书，积累西方经学史的重要文献，改变我国西学研究长期偏重哲学论著、忽略宗教经典注疏的偏颇，以期对西方文明有整全而深入的理解。且在此基础上，鼓励、催生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对话和汇通。对“经典”的述作，旨在传承、固守、辨析一种文明形态的思想光谱，垒砌一种文明发展的基石。

“圣经图书馆”以“文史哲”为进路；旨在消弭“文史哲”的分割，此乃是中西方共通的古典治学之道。其中，以“文”为基础，即对文本的字、句，文法的分析和理解，包括训诂和修辞（或辩说）两大部分。古拉比及古希罗学人注重解经学和修辞学，中国先人自有类似注疏治学传统，讲究从“小学”进至“大学”。“小学”以字词训诂、文言语法和音韵为主，通晓字义和句义后，进入“大学”，在天地宇宙的视域中体认求索修身治国之道。以儒家为例，传统中国的“大学”建立在对德的自觉体认之上，天道统摄人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明明德篇》）。而西方的“大学”则以哲学为主，亚里士多德以神学为第一哲学，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基本认同了这一看法，把“文史哲”的方法转换为以圣经文本为主，继而遍寻史料史实，再以系统神学或神哲学为至真。

“圣经图书馆”规划出版研经工具书、参考书和注经书，旁涉文化背景探讨、史料整理和思想梳理，同时鼓励圣经跨文化解读方面的翻译和原创著作，以此裨益汉语及全球学界。在“置身区域，迈向环球”的大趋势下，“圣经图书馆”的撰述编译工作由国内外学者承担，并邀请国际圣经学界资深学术顾问，发轫并共臻经典编撰这一学术事业。

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

The Biblical Library

Chief Editors: K. K. Yeo; Hui Liang

Prospectus

To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studies to China contains both blessing and danger. The dilemma they confront is how to embrace the good and to reject that which threatens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China. The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remains the central *problematique* for many Chinese scholars today. The series editors believe that the philosophy, morality, and religious practice of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their own etiologies worthy of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East and West have given rise to civilizations, world views, and cultural excellence that owe their origin to foundational texts or Scriptures. These classical texts are deemed sacred; they contain the wisdom of prophets and sages, have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continue to shape contemporary global societies. When these texts are read intertextually, respectfully and appreciatively, they will benefit the peoples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ne of the central texts and cornerston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the Holy Bible. Now it is a prized possession of the world, and not the monopoly of Europe or the West alone. Students of world scriptures toda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such texts historically and to develop fresh new hermeneutical insights for entering into dialogue with them. The Biblical Library,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sacred Scriptures of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its universal readers on the other. The biblical text contends that all scripture is inspired by Go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for reproof, for correction, and for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2 Timothy 3:16)

The Biblical Library, seeks to promote the wholistic approach to Scripture through methodological and exegetical studie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and finally through philosophical and conceptual inquiry. Being grounded on the Chinese horizon but committed to benefit glob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s, the objective of the Series is consistent with classical Confucianist, Daoist, rabbinic, and Greco-Roman studies. Thus, the Series aims to publish biblical introductions, commentaries, translations, and hermeneutical studies of the Bible.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Series encourages the intertextual and cross-cultural reading of the Bible with the varied cultures of China. The Series hopes to benefit Chinese readers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scholarship of Western readers. We value indigenous theolog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e diversity of the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as well as writers, editors, and translators, will illu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

圣经图书馆

The Biblical Library

主编

Chief Editors

杨克勤 梁慧

K. K. Yeo, Hui Liang

学术顾问委员(以中文姓氏笔划为序)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n the order of the number of strokes in Chinese surnames)

贝尔(美国海涵学会) David Baer (Overseas Council, USA)

朱厄特(德国海德堡大学) Robert Jewett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 Liu Xiaof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C)

克拉兹(德国哥廷根大学) Reinhard Gregor Kratz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Germany)

克莱因(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Jacob Klein (Bar-Ilan University, Israel)

麦格拉思(英国牛津大学) Alister McGrath (Oxford University, UK)

帕特(美国范德比特大学) Daniel Patte (Vanderbilt University, USA)

佩杜(美国布莱特神学院) Leo G. Perdue (Brite Divinity School, USA)

罗宾斯(美国爱默瑞大学) Vernon Robbins (Emory University, USA)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Zhuo Xinp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C)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 Yang Huil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C)

赵敦华(中国北京大学) Zhao Dunhua (Beijing University, PRC)

柯林斯(美国耶鲁神学院) John J. Collins (Yale Divinity School, USA)

威瑟林顿(美国阿斯伯里神学院) Ben Witherington III (Asbury Seminary, USA)

格斯滕伯格(德国马堡大学) Erhard S. Gerstenberger (University of Marburg, Germany)

朗曼(美国威斯蒙特学院) Tremper Longman (Westmont College, USA)

萨肯菲尔德(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 K. D. Sakenfeld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温特(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Bruce Winter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奥登(美国德鲁大学) Thomas C. Oden (Drew University, USA)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6

第一章 总论 /57

第二章 耶稣的神迹 /140

第三章 洗礼与重生 /158

第四章 井边宣言：我是！ /181

第五章 律法与恩典 /206

第六章 弥赛亚概念之争 /225

第七章 判断权问题 /252

第八章 罪、审判、自由 /273

第九章 罪与苦难 /298

第十章 耶稣的跟随者 /314

第十一章 马利亚和马大 /328

第十二章 进入耶路撒冷 /343

第十三章 耶稣的爱 /363

第十四章 门徒的跟随困境 /390

第十五章 门徒的福音使命 /421

第十六章 苦难问题 /438

第十七章 成圣问题 /464

第十八章 耶稣的被捕和受审 /481

第十九章 耶稣受难 /496

第二十章 耶稣复活 /517

第二十一章 爱与跟随 /536

附录一 《约翰福音》译文 /550

附录二 希—中单词对照表 /576

参考书目 /580

主题索引 /585

序 言

西方思想史在奥古斯丁(西元 354—430)之后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希腊哲学失去了动力，而基督教神学主导了思想方向。早在 1992 年，这个思想史转变就成了我研究西学的中心关注。那时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教研室为了教学需要决定集中力量编写一本西方哲学通史。我负责古希腊哲学史部分，从泰利士到普罗提诺(我完成了编写工作，留下 30 万言的书稿。后来因为留学美国，加上其他原因，导致书稿遗失)。我写完普罗提诺(西元 4 世纪)之后发现，从 4 世纪开始，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思想家越来越不像样子，而基督徒思想家说话的底气越来越足。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心中一动，如果我们对基督教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这个问题从此一直伴随我的思考，基督教的哪个文本对希腊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1994 年，我开始在美国洛杉矶近郊的克莱门特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攻读宗教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开始涉足基督教思想史，并很快就注意到《约翰福音》使用了一些希腊哲学的核心名词。2001 年，北美华人基督教学者年会在芝加哥举行，我提交了一篇论文：“《约翰福音》和古希腊哲学”(后发表在《外国哲学》第 16 期，2004)。论文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处理《约翰福音》关于逻各斯、真理、生命、自由等概念的使用。这一思路引起了在场的几位新约专家的重视并博得好评。于是，我要对《约翰福音》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念头就被激活了，并有了这十年的心血倾注。

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际说，他终于明白了“预设和忏悔的区别：一边是一些对道路无知却以为知道了去那里的人，一边是道路——在这道路上不但看见了福祉之地，而且与之同在。”（《忏悔录》第7卷第20章）奥古斯丁的这个说法指出了希腊哲学思路和基督教思路的根本区别。我们知道，希腊哲学设定了真理的存在，然后开始寻找道路去认识真理。人们在对道路无知的情况下就在谈论真理，认为真理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奥古斯丁早年就是在这个思路中寻找真理的，最后陷入了怀疑主义困境。但是，基督教认为，真理不是在判断中的预设，而是一种情感指向。即使真理就在面前，人在判断中无法认出真理，反而会加以拒绝。因此，除非真理自己来到人面前宣告自己的真理身份，而人放弃真理判断权，相信并跟随这宣告者，以他为道路，否则，人是无法和真理发生关系的。换句话说，希腊哲学的真理谈论方式是：在判断中预设真理在先，寻找道路认识真理在后；而基督教的真理谈论方式则是：相信跟随（道路）在先，接受真理给予在后。前者称为理性认识论，后者称为恩典真理论。就文本而言，恩典真理论是在《约翰福音》中提出来的。我希望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展示这个恩典真理论对希腊哲学真理困境的回应。

思想史分析离不开文本分析。当代新约学术界已经十分发达，学者们试图从各种角度并采用各种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几乎深入到文本的每一个字。不过，虽然《约翰福音》注释单单英文著作就超过二百种，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进入这本福音书的著作，据我所知，尚无先例。因此，我更加关心的是历代基督徒思想家关于《约翰福音》的理解。奥利金、奥古斯丁、加尔文等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都注释过《约翰福音》。我对他们的理解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同时，为了比较简洁地展示《约翰福音》的思想力量，我把当代《约翰福音》研究成果中与思想史无关的讨论都忽略不计。因此，我在本书后列出的参考书中，不是简单把全部《约翰福音》注释本都列上，而是仅仅列上与本书讨论相关的部分。作为思想史著作，我着墨较多的是概念界定、命题构成、以及命题演算等方面分析。

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约翰福音》的希腊文文本考据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我的希腊文知识有限，根本无法加入他们的讨论。不过，我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肯定。也就是说，一般地，我不评论他们的工作得失。本书所依据的《约翰福音》希腊文文本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Tischendorf 的希腊文编辑本。这个编辑本目前比较通用。它挂在了“巨宝网”(<http://greattreasures.org/gnt/main.do>)上。我每次打开电脑写作时，同时打开这个网站。本书的分析和讨论，每一步都离不开它，所涉及的希腊文文法分析都依据这个网站的说法。另一种是 Westcott/Hort 编辑的《约翰福音》希腊文原文，载于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3)。当这两种文本之间出现差异时，我就只能凭自己对《约翰福音》的阅读感觉而采用其中一种。我的译文主要以这两种原文编辑本为据。

《约翰福音》的中文翻译虽然不下十种，但是，真正被大量阅读的只有和合本、吕振中本、以及思高本。和合本基本上是依据 1881 年的英文钦定本修订版(The English Revised Version of 1881, 这个英文本依据 Souter's Text 希腊文编辑本【Hort 参与了这个编辑本的工作】)。不过，我在阅读时还是感觉到和合本参考了希腊文原文(不知道用那个编辑本，估计是 Souter's Text)。翻译者不提希腊文原文一事，我估计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希腊文原文专家。和合本的读者量最大。我在翻译时十分重视它。吕振中本的翻译按公开的说法是依据 Souter's Text 希腊文编辑本。不过，就行文而言，吕振中的翻译同样深受英文钦定本修订版的影响。与和合本在翻译上其实是同源的。不同的是，和合本是中文为外语的传教士之译文，吕振中则是中文为母语的译者。思高本自称直接从希腊文(Augustinus Merk 的希腊文—拉丁文对照编辑本,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 Rome: Pontificii Instituti Biblici, 1951)译出。虽说参考了和合本，思高本却在一系列人名地名翻译上自立门户。我不太喜欢这种做法，渐渐地放弃了讨论它的译文的兴趣。

英文翻译界出版了数不胜数的译本。我不想深入考察英译本的版本学。坦白地说，我较多参考的是两个译本：新国际版(New Inter-

national Version)和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这样做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主要是这两个译本是我多年阅读《圣经》的文本。

在翻译上，我的做法是，先弄清希腊文原文的字义和语法结构，并给出一种大概的翻译，然后把自己的理解和这些中英文译本加以对比，接着对自己的译文进行修改，在文本分析讨论完之后再行润色译文。可以说，在译文方面，我没有吝啬时间和精力。

对于《新约》专家来说，我的这本思想史著作忽略了很多《新约》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修养不足。动笔之前，就有好友好心劝告我不要去碰《新约》学术界。除非在其中混迹多年，深谙其中动向和规矩，否则，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招致攻击。但是，我还是没有听从这个劝告，半只脚踏进了《新约》学术界。我始终相信，这种思想史的角度也许能够给《新约》学术界提供一种新的阅读角度。

我把一本被判定为宗教性的著作引入思想史研究领域，对于哲学史学术界来说，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越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新约》学者和希腊哲学史学者之间几乎是不相互来往的，彼此关心的问题似乎毫不相关。我衷心希望中国学术界不往这个方向走。我希望，提供这一个文本分析，让文本自己说话，让文本在解释中说话，而我的解释来自我的阅读。在我的阅读中，这本宗教性的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哲学史著作。

本书写作思路始于2001年。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翻译并注疏《约翰福音》这样一部被广泛阅读和研究的文献，并非我想的那么容易。2006年，我以为很快就能完成并出版。在这期间，我把写出来的注释给了很多人看，甚至把前八章挂在网上供人批评讨论。同时，我在北美的一些学校等地多次讲授《约翰福音》这个文本。这种做法是互动性的，对我的注释和讨论从理解、表述、神学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因此有机会更仔细更深入地考虑不同层次读者的反应和他们提出的问题。这种来自读者的压力对我来说是内在的而且是良性的。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我于2005年加盟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和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07年，本书写作受到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在

这期间,我有机会在更加广泛范围内与同行交流。特别是在研究中心的同行们以及来往的国内外犹太教专家们交流中,我对西元一世纪时期的和犹太文化传统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这对本书进一步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此,我要特别感谢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的同事们。

出版这部著作,我心中想到三件事,首先是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现状。自从陈康的《巴门尼德斯篇》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出版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西方古典研究的进展断断续续。我们在译介上付出了不少努力,近年来成绩也算可观。不过,独立的文本研究专著才是奠定古典研究的基石。我愿意以这本研究专著铺上一块石头。其次,我还想到了汉语基督教教会神学。马丁·路德谈到,只要《约翰福音》和《罗马书》仍存,基督教就不会消亡。因此,《约翰福音》对汉语基督教神学构造有主导性作用。我觉得,在缺乏对《约翰福音》思想史解读的基础上所建构的神学是无法对中国思想界说话的。第三,我想到的是未来的中国思想走向。我们知道,17—18世纪,在天主教传教士的努力下,西方思想界出现过“东学西渐”这一历史现象。当时,中国思想家说话是充满底气的。但是,19世纪以来,新教传教在中国思想界开始了“西学东渐”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思想家一直走不出译介的束缚,害怕自己误解了文本,以至于陷入不提西人名字则无法说话的困境。陈康在出版《巴门尼德斯篇》时谈道,中国人得有自己的独立的西学研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内在的写作动力,即:呈现一本有中国人生存关注,有中国人思维方式,有中国人的独立思维的西学研究著作。

我相信,未来中国思想界应该是有容乃大的思想界!

谢文郁

二零一一年八月

南加州 West Covina

导 论

《约翰福音》往往只是被归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在西语哲学史学界的研究中不太受重视。受这一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中国学术界的西学研究几乎不提《约翰福音》。这种状况严重妨碍了我们对西方思想史的深入把握。同时，在圣经研究界，过去几十年来的主导思路是，尽量淡化脱离希腊哲学和《约翰福音》的关系，认为它的写作和出版属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它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借用了一些希腊哲学的名词。这后一种处理在宗教上给了《约翰福音》足够高的地位。但是，我们在处理《约翰福音》的一些核心概念时往往显得束手无措，比如，人们对书中大量出现的“荣耀”一词采取放弃理解的做法。这两种几乎是完全对立的处理方式，在我看来，乃是缺乏思想史视角所致。

就语言现象而言，《约翰福音》用希腊文写作。其文风简单明了不求华丽；但概念使用有深度反思，界定明确且一以贯之。文体叙事为主，但内含论证。这样一种写法，其本意乃是要呈现概念并表达思想，而非仅仅记载事件（作为史书）或刻画性格（作为文学著作）。而且，其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真理、信心（信念）、荣耀（意见）、恩典、生命等等，都是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仅仅从这种名词共用现象就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和希腊哲学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系，需要我们深入探讨。

就学术史而言，近代以来，西语学术界（包括思想史学界和圣经学

界)关于《约翰福音》和希腊哲学之间关系的处理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世纪的德国学术界所主导。在这个时期,人们相当重视《约翰福音》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认为《约翰福音》的写作深受当时希腊哲学的影响,并提出 $\lambdaόγος$ (参考这几种翻译:逻各斯、道、圣言、话)一词的使用来说明这种关系。^①第二个时期始于20世纪初,主要是一些以英文为写作语言的学者深深地感受到,《约翰福音》赋予这些概念的意义和希腊哲学关于它们的界定在根基上存在着明显差别。因此,英语学术界渐渐为另一种说法主导,即《约翰福音》的整个思路和希腊哲学几乎没有任何共同性。这种说法认为,《约翰福音》关于 $\lambdaόγος$ 这个字的使用,除了它们之间的用词相同之外,各自所表达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强求它们之间的思想承传关系无助于我们阅读《约翰福音》。^②

上述两派的说法都触及了《约翰福音》和希腊哲学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双方都注意到它们共用了某些重要名词。这些名词同时是希腊哲学和《约翰福音》的中心概念。其他福音书或者几乎没有提及,或者只是当作日常用语,不形成概念。如果说《约翰福音》在这些名词

① 这一传统,一般说来,大概起于施特劳斯的《耶稣传》(David Friedrich Strauss *Das Leben Jesu*, 1835年出版;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99年刊印)。施特劳斯强调历史,并从近代历史学的史观出发处理福音书中的耶稣,声称要还原历史上的耶稣。这种想法后来引导出德国的“宗教历史学派”(Religions-geschichtliche Schule,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所谓的“小哥廷根教授团”(little Göttingen faculty)组成。这个学派认为,任何文本都有其历史渊源,而《约翰福音》的渊源便是犹太思想和希腊思想之结合。关于这一学派的历史及其研究成果,参阅 James C. Livingston 等合著的《现代基督教思想》(Modern Christian Thought, Prentice Hall, 1999)的第一章。

② 就我的阅读来说,我认为,这种想法的明确表达应该开始于 A. T. Robertson 的《第四福音书》(The fourth Gospel: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Word pictures in the New Testament】), Harper, 1932);中文版参见詹正义主编《新约希腊文解经》卷三,美国活泉出版社,1998年)。Robertson 在注释 1:1 时,特别指出,虽然 $\lambdaόγος$ 一词出现在赫拉克利特以及当时的斯多亚学派的著作中,甚至出现在深受希腊思想影响的犹太哲学家菲洛的著作中,但是,《约翰福音》的 $\lambdaόγος$ 指的是一个有位格并在整个世界创造之先就已存在的基督,和这些哲学家的用法完全不同。因此,凭据这个概念无法建立《约翰福音》和希腊哲学之间的思想关联。Robertson 的这种说法对英语圣经研究界的影响十分深远。卡森属于在 Robertson 影响下的《约翰福音》注经家。在评论这一点时,他谈到,那种认为《约翰福音》乃是希腊化思潮的产物的说法已经过时了。参阅卡森:《约翰福音注释》,潘秋松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07年,第 91 页。

上和希腊哲学没有关联，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它们的来龙去脉。当然，我们注意到这一文本事实：即《约翰福音》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不同于希腊哲学。如果简单地因为两者各自对这些名词的界定不同而否定两者的思想联系，那么，我们将很难说明《约翰福音》为何如此重视这些名词，努力进行重新界定并大量使用。深入阅读《约翰福音》，我们能够感觉到，它对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及其困境有深刻体会。不仅如此，它还强势地表现出为希腊哲学指点迷津的倾向。换句话说，《约翰福音》的写作思路虽然不在希腊哲学传统中，却强烈地表现出挑战希腊哲学的态势。呈现这一挑战态势是本书的主要思路。我认为，从挑战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和希腊哲学的关系，可能更有助于我们追踪《约翰福音》在一些核心概念上的来龙去脉，从而能够恰当地为它在西方思想史上定位。

在思想史视角中应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呢？就纯粹文本而言，《约翰福音》的主要内容是要呈现耶稣这个历史人物的基督（弥赛亚）身份。耶稣故事本身是唯一的，具有原始性。分析一个历史故事，我们注意到如下两个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讲者本人的思想背景和生存关注决定了故事的细节取舍和重点强调。讲者不会谈自己不关心或无法理解的细节。就大的背景而言，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思想背景和生存关注相去甚远。如果讲者是一个希腊人，和他作为一个希伯来人来讲这个故事，所呈现的耶稣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进一步划分，作为希腊思想家和作为希腊历史学家，他们呈现故事的方式也将很不相同。因此，在处理《约翰福音》时，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它的作者问题，揭示他（们）的思想背景和生存关注。其次，听众的思想背景和生存关注也参与了故事的细节取舍和重点强调。讲者在讲故事时，如果这个故事和听众的思想背景及生存关注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故事的听众就会越来越少。相反，如果这个故事和听众的心思意念拍上了节拍，那么，听众的兴趣就会不断增长，而讲者的兴致也会相应地水涨船高。也就是说，一个故事的呈现一定有听众的参与。因此，《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的思想背景和生存关注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从这个两个角度看，《约翰福音》的写作显然不是单一背景的，既